

温州市图书馆 编
陈伟玲 整理

趙鈞日记

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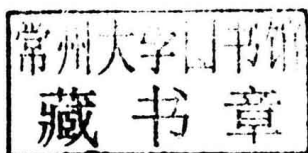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中华书局

温州市图书馆 编 陈伟玲 整理

趙鈞日記

上

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赵钧日记/温州市图书馆编;陈伟玲整理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 2018.2

(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)

ISBN 978-7-101-12819-2

I. 赵… II. ①温…②陈… III. 赵钧(1786~1866) - 日记
IV. K825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24855 号

-
- | | |
|-------|--|
| 书 名 | 赵钧日记(全二册) |
| 编 者 | 温州市图书馆 |
| 点 校 者 | 陈伟玲 |
| 丛 书 名 |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|
| 责任编辑 | 张玉亮 |
| 出版发行 |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http://www.zhbc.com.cn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 |
| 印 刷 |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|
| 版 次 | 201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201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|
| 规 格 |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张 23¼ 插页 7 字数 550 千字 |
| 印 数 | 1-2000 册 |
| 国际书号 | ISBN 978-7-101-12819-2 |
| 定 价 | 80.00 元 |
-



赵钧《过来语》稿本

卷之六

平邑楊濟洪忠實固廉保境八鄰人民安功益大洪卅年前水母

命捐以郡縣育嬰堂四百萬只銀百兩身給以重九增積資財

二、林生号针洗 佛以号琴溪貢生

十七日義士高士祝 百康生 援有銀色石頂協同非君家珍卿政卿

會通屬國諸侯賦菁說卷約三日内請官兵助攻可以直搗賊

頭賦

十六晚小門生宗意元來宿宵外次為祀言祈善出門謂外間喧傳

錢遜十七日攻卽撤十八日攻瑞邑守知安必旁預示日期以理果速是

時道路不通。距市半里。故誤信如是。

十年前余至館丁田村君邀象湖觀富室也。有田二千頃餘。貯水壘。

不數年，其父身歿，思為數年，訟二寶財，繼卒，其子析產，一畝田，得田九畝，可見人聚惟守，今舍取為貴。

開九月廿六日粵匪竄入潮州境廿九日入揭陽境

耶律楚材云。國家以兵革牽制。則太平可致。漸和是言。卒卒

自今起。已令置之不治。并與義國洋銀。人謂今亦請還。亦予回也。

至禍焚蔓延、焚劫數三所、進行、道府各人置多問、聞致令、

民仁孝皇、延應統、八月六日延壽殿、如入寺人之儀、各街署、其

摺括、劫監奪印、惟所欲為、故既去復來、九月朔日再犯、時奉永

邑人高公尚書、臨終、開門延夢、賊俱奔逃、溺而死、傷者不下三

百人而輿職尚如故也。焚劫村序，勒罰富戶，道路不通，實爲虐政。

因病誤開門園費金二萬三千方丈其為由是世道

憲法情故直曉定到病逐月獎賊如鬼不敢進動屬官文

咸丰辛酉年关于金钱会事件的记载

一 義大有禮
一 幽明同禮
一 死生有命
一 黑物掩身
一 蓮花呈瑞
一 伏義君子

一 橄欖頭鬼
一 祭鬼太誦
一 視死如生
一 改名得名
一 田舍賢人

讀後錄

小岐山房主人著

一 王昌林太史

序

夕竹刻志并附寒夜堂擬錦漢書

弱歲登舍聲噪藝林時與鮑上舍而作相頤頗費

太史人吳氏茹荼宇志幽懿及未識有和丸畫款

爪生未過時晉瑛名流揮金如土太史人恬不介

意其門內之子文滴聲皆太史人善亦不置力也

甲子年春廉我長就進士入詞垣去入津時已世稔

矣互都中書未出文好時云自我為泚生時屬蹢躅

聞之未嘗真吾子也也世自道詞有忘更哉

古今一轍

一 項孝廉

國衡為泚生時在吾舍中嘗向友人指授足

趙鈞《譚后錄》稿本

60219

過來語鈔

清瑤安趙鈞石湯著

张崑节录本《过来语钞》

定齋安居日記

辛酉

元旦早起時見天高晴霽心喜早膳成領家人詣名土歌廟。

歸作祖先影堂畢半幼交賀年午飯後醮帶卷心

及各房人到堂石沙門渴甚返時尚早晝白冷食菜

梗有味晴時微雨。

初二雨門庭清靜食凍肉油菜有味。

初三小雨食凍肉油菜甚佳。

初四晴食同。

初五晴食同。

初六雨食同。

初七晴食同甚有鮮魚。

初八晴食同。

《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》出版说明

编辑出版《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》，旨在为学术界提供完备、可靠的基本资料。

日记体裁的特殊性，使其具有其他种类文献所不具备的史料价值。日记中的资料，有的为通行文献所不载，有的可与通行文献相互印证、补充，有的可以订正通行文献中的讹误。中国近代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都留有非常丰富的日记，较为著名的有晚清四大日记翁同龢《翁文恭公日记》、李慈铭《越缦堂日记》、王闿运《湘绮楼日记》、叶昌炽《缘督庐日记》等，都是具有较高史料价值、经常被学者征引的重要文献。

然而许多日记文献藏于图书馆、博物馆、研究机构或个人手中，学者访求不便。为此，系统发掘整理这类文献，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。中华书局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策划《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》，出版了多个品种，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好评，《翁同龢日记》、《郑孝胥日记》等至今仍是引用率较高的近代日记整理本。

新世纪以来，我们继承这一传统，加大近代人物日记的出版力度，试图通过进一步完善整理体例、新编更便利使用的索引、搜集更完备的附录资料等方式，使这套丛书发挥更大的作用，继续为学术研究贡献力量。

编好这套丛书，一定会遇到不少困难，但我们相信，在学术

界、文博界和公私收藏机构与个人的大力支持下,这套有着悠久历史的基本文献丛书将会有更多更完备、精良的品种问世并传世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前 言

赵钧《过来语》与张枏《杜隐园日记》、刘绍宽《厚庄日记》是近代温州篇幅较大的三部日记,是研究清中期至民国时期浙南历史的重要地方文献。相对于史料留存较为丰富的清末光、宣期、民国时期,道、咸、同时期的温州史料极为缺乏,赵钧翔实的记载为研究这一时期地方历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。周梦江曾将其中较有史料意义者整理成《赵钧〈过来语〉辑录》,发表于《近代史资料》(1979年第4期总41号,111—205页),并受到研究者重视。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,近年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。

赵钧(1786—1866),字石渠,号定斋,瑞安人,庠生。著有《过来语》、《谭后录》等,“欲藉以验己学问,考功过,且以知处世之非易易”。《谭后录》辑自《过来语》。清末民国时,同乡张枏、张慕骞父子曾借阅,据张慕骞民国二十七年《过来语钞》^①跋,《谭后录》不少条目不见于《过来语》,下卷个别条目有目无文,知“《过来语》所佚者尚多,即《谭后录》散失者亦当不在少数”。

现存《过来语》二十册,第十八册外,其余均为清稿本。赵钧处馆馀暇,“将历年所记《过来语》稿,手自誊抄”。第十八册记同治三年、四年、五年间事,为稿本,文字潦草;第十九册亦记载同治三年、四

^① 张慕骞从赵钧《谭后录》手稿中摘抄一部分外,另从《过来语》中摘抄部分书眉自标“谈后录”三字及虽未标明而纪载内容显属“谈后”一类者,成《过来语钞》,并作跋文二篇,为了解赵钧生平及《过来语》留存情况提供了重要的信息。

年(部分)事,为清稿本,在誊写时内容微调。至于《过来语》的总册数,有三四十册和七十多册之说。张栢《杜隐园日记》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三十日记载此书“自嘉庆丁卯年记起”,时闻其书“有三四十册”,正是赵钧曾孙赵德宽师从张栢之时。据张慕骞为《过来语钞》所作跋文,两次提及册数,“闻家大人称早岁曾见《过来语》共四十册,今竟止此二十二册,犹连《谈后录》在内”,“《过来语》未分卷,不知原出确数多少,据戴君守雅谓闻之赵氏后人,共有七十餘册,今所见者止二十本,其末帙尚为《安居日记》”,并未附二十册的卷页表,与现存册页绝大部分一致,细节方面略有出入。赵氏后人所谓七十餘册,或为稿本、清稿本合计之总册数,张栢所闻三四十册当为稿本或清稿本册数。

现存日记起道光六年(1826),迄同治五年(1866),末附《安居日记》一册,时间跨度四十年。无道光三十年,咸丰元年、二年、九年,同治二年日记。从现存《过来语》多处行文,不难发现此书确有散佚。咸丰三年二月日记“记庚戌《过来语》稿,可查稿”,咸丰八年八月记“连日翻阅旧订《过来语》甲申、乙酉后三四年间所记”,同治五年二月记“钱邑主灭旨征粮事,在同治元年,记癸亥《过来》册”,道光四年(甲申)、道光五年(乙酉)、道光三十年(庚戌)、同治二年(癸亥)确有日记。道光十七年赵钧言“余自壮岁以来,处馆于外,每日馆课毕,或读书,或听座客话,偶有感悟,辄便札记,此事亦大有益”,且生平处馆五十餘年,著述虽多,有《过来语》、《有济编》、《谭后录》、《补拙录》、《碎金》、《颐志集》、《定斋杂记》、《读书记》、《定斋吟草》等,“其它种种著述要多从《过来语》中蜕变来”(《〈过来语钞〉跋》),道光十四年日记摘录嘉庆十五年的日记已经“蠹蚀不可识认”,张栢亦言嘉庆十二年(丁卯)有日记。毋庸置疑,嘉庆年间已开始记录,

且壮岁后处馆多馀暇,《过来语》的记录向来及时。嘉庆十二年(至少)至道光五年间,应有日记,张栢所闻三四十册,并非虚言,或许在岁月的无情流转中,将近一半的篇幅早已悄无声息湮没在历史的浊流之中,如能保存,其史料价值更显珍贵。

作为日记体的《过来语》,赵钧长期处馆瑞安乡村各地,身为下层知识分子,其记载的内容相对生活化、平民化,“一无所讳,非以示人”,立场相对客观,主要涉及地方的吏治、粮价、灾异、兵事、交易、科举、饮食、习俗、社会风气、地方纷争、时人轶事、人口迁移、家族兴衰、公益事业等,为多方面研究地方近代史、社会生活史等提供了可靠而细致的史料,进而折射出中国近代沿海地区社会风貌的变迁,是对偏重宏观研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微观史料方面的重要补充。兹举例说明《过来语》几点重要的史料价值。

道、咸、同年间自然灾害频繁,粮价上涨,民众遭受到严重的生存压力。这也奠定了该时期地方社会多灾多难、动荡不堪的基调。据对现存《过来语》灾异及粮价史料的爬梳,道、咸、同年间的粮价有三段典型的相对高位期(就整体趋势而言),分别为:道光十年至十四年,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,咸丰三年至同治三年。如道光十二年五六月,阴雨绵绵,邑中多疫病,八月大风雨,荡园所种木棉、番薯等都被淹没,稻子所收无几,闰九月雨雹如豆,十一月连日雨雪,苦寒不可当,冻死者所在多有。十三年六七月大风水,早禾少收成,九月潮溢,田中多蟹,秋后多痧症,十二月大寒,多雨雪。十四年三月多雨而寒,谷种多烂,四月秧多被田蟹损坏,六月大水,兼多虫灾。十二年十月以后至十三年五月,谷价已达千八百。十四年正、二月二千,三月二千三四百,四月二千六七百,五月望后三千。以十四年的受灾情况为最严重,“大饥,饿莩处处有之。城间乞人饿死者,日

日有之。又大疫,无处无病人,死者甚多”。大风水、潮溢、寒潮、雨雪、疫病是现存起讫四十年日记里民众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关键词,有灾之年占了二十几年,灾害频生,粮食短缺,粮价上涨,个别富户借机牟取暴利,官府催科政急,民众深受其害,饿死、冻死、病死者在有之,即使素称富庶的村庄如屿头村,咸丰年间三百余户中柴米不绝之家,不到十户。作为下层知识分子,赵钧生活清贫,深知疾苦,其笔下对灾异、粮价的记载异常详细,生动地展现了当时浙南民众的生存之艰。而瑞安作为当时温州的重要产粮区,“沿海一带潮湿之区,米谷难于久贮,又山多田少,民间鲜有盖藏。温州则全赖平阳、瑞安”(《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》卷一七四之一三)^①。瑞安粮食丰歉、粮价的波动对浙南地区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。赵钧的这些记载为研究道、咸、同时期浙南地区的经济、社会生活提供了珍贵的史料。

在如此严酷的自然环境下,来自社会的压迫变本加厉。当时浙南地区的地租剥削率极高,每亩地租高达二百斤到三百斤,靠近河边的上等田,有时高达四百斤,约占全年收获量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,超过了全国的地租剥削率^②。除地租外,还有其他剥削方式。道光十二年闰九月赵钧记道:“贫民佃种租田,田好租轻者,尚少有所得,否则,通盘估算,徒自贱苦耳。其他私项陋习,更不可效。温郡近来多此习。此窍务农者不知。余闲时从中细计之,特为指出。贫民少资本者,不如别寻小经纪,用力谋生也。”重灾之下,贫民甚至需要贱价卖田,虽断定几年后可以赎回,只是条件极端苛刻。咸丰三年十

① 节录清雍正九年(1731)六月十九日浙江总督管巡府事李卫奏疏语。

② 周梦江,马允伦,蔡启东.试论金钱会起义的原因[J].温州师专学报:社会科学版,1980(01)

月记：“上年廿餘千一亩荡地田园，本秋只值七千。买主又扣垫札钱五百文，仲钱二百五十文，卖主只得实钱六千式百五十文。契连虚注价七千七百文，断定六年外取赎。札注明年上季交上手租钱五百文，下季交上手租钱一千文。”在层层剥削中，贫民朝不保夕。咸丰四年七月虽然粮食丰收，但谷价大跌，赎回田地，谈何容易！咸丰五年十二月记：“吾瓯又连年灾荒，有田之家半价而售，甚有只得四分、三分之一者，窘急何如。”减价卖地的结果只能使富者益富，贫者益贫，土地兼并加剧，越来越集中于富户手中。以富户为代表的群体，从事典当和高利贷活动，进一步强化对贫民的剥削，据赵钧记载，“瓯俗典铺起息，比省会重三倍有馀”，且极为普遍。来自官方的赋役负担也进一步加重。鸦片战争后，清政府为了偿付战争赔款，田赋加征更为苛刻。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记县令赵景铭“无政不酷，视民如仇，事事令人欲哭。而催科政急，粮价更增，又其馀也。冬十一月，下乡亲征日，粮价新银一两价式千八百，新米一石价六千”，而据乡邻郁翁说，“二三十年前，邑人上控后，银价一两千五百，米价一石二千外”。即一两地丁银折价比战前增加将近一倍，一石漕米折价比战前增加两倍，田赋负担等于增加了一倍到两倍^①。咸丰四、五、六三年的田赋也非常高，处于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时期，清政府亟需军费。又恰逢灾害频发，赵钧感慨道“三四年来，质库往来如织，赎当者十不得一，百姓窘迫如何”。贫民在天灾面前自顾不暇，富户自然成为政府搜刮的重点对象，损失尤为严重。咸丰四年二月记“现在十室九空，朝廷又下捐输之诏，州县承上官意旨，只图取媚，不顾大体，时谓之勒捐。闻之惊骇。黄抚军宗汉严札州县，着其依限

^① 周梦江，马允伦，蔡启东：试论金钱会起义的原因[J]．温州师专学报：社会科学版，1980(01)

照数,令各殷户赶紧捐纳,否则动用火签拘提如重犯”。鉴于当时已经“十室九空”,因此这里的殷户自然包含部分士绅。咸丰八年二月蔡小琴、叶玉璇等绅衿认为官府田粮银价一两折钱二千九百八十文太重,于是向县令请求恢复自封投柜旧例,虽减去三百,官府仍然是这场骚乱的获利者,而“贫户制于胥吏,实无多益”。

为了争取各自的生存空间和优势,处于优势的群体倾轧劣势的,劣势的惨遭剥削、又于无可奈何之际起而反抗,同一群体内部亦产生裂痕,浙南社会关系处于高度紧张中,主要表现为三类矛盾:官与民、绅;贫民与富户;上层士绅与下层士绅、有财无势的富户。官与民、绅的矛盾,可从官方的赋役负担加重中得到集中体现。贫民与富户的矛盾,是跟道、咸、同年间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有直接的关联。对于大多数小农家庭来说,为了支付高额的地租、高利贷利息以及官方的田赋等,不得不出让粮食,在天灾频仍的道、咸、同时期,收成锐减,重压之下更加困苦不堪。道光十四年,官府本应早日出示减定粮价,却一味姑息,“使富者相时射利,贫者蓄怨日深”。田有饿莩,市有馀粮,富户乘机提高粮价,大发灾难财。饥荒往往逼迫贫民走上“不法之途”,劫粮事件时有发生。赵钧认为“非饥民好为乱,富者有以激之也;富民之贪欲无厌,刘邑尊有以养之也”。不少贫民贱卖土地,甚而脱离原来的宗法组织,成为流民。道、咸、同年间自然灾害的频繁与严重,折射出当时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的动荡程度。上层士绅与下层士绅、有财无势的富户之间的矛盾,主要原因在于官府苛捐杂税重压下,贫民自身难保,官府将勒派纳捐的对象直指富户与士绅。上层士绅往往占据有利的地位。赵钧在咸丰四年里记载了姜、陈二姓富户被迫捐输一事,为了解当时的纳捐情况提供了绝佳的材料。瑞安主捐输事者为孙锵鸣、沈丹书,是上层士